

论重庆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推进机制

程莉^{1, 2} 兰鋈²¹

(1.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重庆 400067)

(2. 重庆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基于 2000—2016 年相关指标数据,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了重庆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重庆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得分不断提升, 重庆农业发展水平和重庆农村产业融合是影响重庆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 计量显示, 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人力资本改善、农业技术进步、财政支农水平和农村金融水平对于促进重庆实现乡村振兴均具有正向的显著效应。重庆应继续以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推动乡村振兴, 并且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进一步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 同时, 要不断健全在农村土地、人才、技术、金融、财政等方面的保障机制, 更好推动重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影响因素 促进机制 重庆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135 (2019) 05-0052-11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广袤农村由此迎来历史性的重大发展机遇。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 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 特色不明显、效益不高。而且, 对乡村开发的功利性定位和乡村文化基因展示不够, 缺乏地区间的联动与协作, 阻滞了乡村资源的有效利用, 乡村经济活力不足, 美丽乡村建设任重道远。那么,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重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如何科学制定合理的指标体系, 并评价重庆乡村振兴的现实情况? 如何合理构建和创新重庆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 是值得探讨与解决的问题。

当前关于乡村振兴影响因素的研究, 学术界尚缺乏直接研究, 多数是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间接讨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工业化、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工业化进程中, 工业的发展不仅对农业生产提出增加产量和改进品种结构的要求, 也为农业技术改进提供物质装备和技术基础, 还为劳动力转移创造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1], 城镇化则向农业提供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支持, 促进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2]。

作者简介: 程莉 (1986—), 女, 重庆万州人,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 兰鋈 (1998—), 女, 重庆綦江人, 重庆工商大学本科生, 主要研究经济学。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重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创新研究”(18SKSJ03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测度、效应与机制研究”(19YJC790016);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创新团队重大培育项目“长江上游(流域)复合生态系统管理创新团队”(CJSYTD201708)。

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难免会通过侵吞或掠夺土地、淡水、劳动力、资本等农业自然与社会资源，带来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下降，从而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3]。

总体上，大量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具有正向拉动作用^[4,5,6]。另外，一些学者也发现财政支农支出^[7,8]、金融支持、基础设施投资^[9]、人力资本积累^[10]、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11]、城市规模^[12]、土地流转^[13]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有积极作用。在农村现代化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上，学者多集中于对乡村转型、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探讨。

戴林送和杨国才、李永宁从农村的农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农民的生活、基础设施、农民的素质、生态环境等方面评价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14,15]。沈费伟、肖泽干从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角度，以浙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16]。李婷婷、龙花楼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人口、土地、产业三个核心要素，从理论上剖析乡村转型发展，并分析了发展要素转型的互馈作用^[17]。何成军、李晓琴、银元对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耦合度进行了评价^[18]。

乡村振兴战略要顺利实施，必须要在推进机制上进行顶层设计。马晓河指出，要从农业现代化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土地要素平等交换以及农民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六个方面进行机制设计^[19]，助推乡村振兴。此外，部分学者还探讨了人才引进、金融支持、财政支农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推动作用^[20,21,22]。

总体而言，上述这些丰富和深刻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然而，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是从全国层面考虑问题，缺乏对地区层面的具体研究，尤其缺少对乡村振兴影响因素及其促进机制的实证分析。因此，以重庆为例，从实证角度探讨重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影响因素与促进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重庆农村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且也能为西部地区甚至全国其他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的发展路径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二、重庆实现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乡村振兴首先在于促进乡村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其次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15个指标分析重庆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其中，劳均耕地面积为耕地面积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比，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总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之比。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可以认为，影响乡村振兴主要是上述四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欲准确预测重庆乡村振兴的发展趋势，为政府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需要对以上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主导因素。

本研究选择主成分分析法，该方法主要通过对多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或指标进行降维、重新组合和改造，形成独立无关、具有较少变量或指标的，能够全面反映原来多个变量组合中所涵盖信息的新组合来替代原组合，用以解决研究问题。

主成分分析法从具体研究步骤来看，主要包括五个层面：(1)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2)检验所有变量的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3)分析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的个数；(4)确定主成分线性组合的表达式；(5)综合评价分析主成分^[23]。

另外，在具体操作中，本文借鉴杨头平、潘桑桑在其研究中采用因子分析法的方式，在进行主成分分析评价时，做出如下处理：首先，通过对每个一级指标层面的相应二级指标做主成分分析，进而得到每个一级指标的得分；其次，基于各一级指标

的得分，以相应一级指标的得分值来做主成分分析，进而得出乡村振兴的综合得分^[24]。

以重庆农业发展为例，首先基于其六个二级指标——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作物产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劳均耕地面积，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为基础，对其做主成分分析，得到重庆农业发展综合得分 H_1 ；然后按照同样方法，分别得到重庆农村产业融合 H_2 、重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H_3 、重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得分 H_4 ，最后，再根据 H_1 、 H_2 、 H_3 、 H_4 做主成分分析，得到重庆乡村振兴综合得分 Z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囿于篇幅限制，在此以重庆农业发展综合得分 H_1 的求解为例，具体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过程如下所示：

1. 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表 1 显示了本文主成分分析部分需要的各指标，从中可看出，各个指标的衡量单位各不相同，因此，首先利用 SPSS 软件对所有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的影响，标准化公式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如公式（1）所示。公式（1）中， X_{ij} 、 $\overline{X_j}$ 为原始数据数量值、平均值与标准差，该方法运用原始数据均值与标准差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是当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数据标准化处理方式。

$$Z_{ij} = \frac{X_{ij} - \overline{X_j}}{\delta_j} \quad (1)$$

2. 相关性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认主成分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接下来对指标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采取 KMO 统计量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部分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程度，最高可达 0.999，由此可以初步判定 7 个指标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能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进一步，KMO 统计量值为 0.676，Bartlett 球形检验伴随概率为 0.000，说明可构建良好的主成分分析模型。

3. 方差贡献度分析与公因子提取

在方法适用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围绕重庆农业发展水平的 7 个指标变量，进一步运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方差贡献度，并选取主成分分析的公共因子。依据主成分分析公因子提取法则，变量 1 和变量 2 的特征值均大于 1，因此，可选取 2 个公因子来体现影响重庆农业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此外，2 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7.968% 和 20.782%，累积贡献率为 88.750%，符合主成分分析公因子提取要求，同时也说明这 2 个公因子能够体现原始数据涵盖的大量信息。

4. 因子载荷矩阵分析

研究进一步采用方差最大化方法来获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初始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根据结果，一般因子载荷越高，该因子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对重庆农业发展水平的解读能力越大，为便于辨认。

由以上 2 个因子可得到重庆农村发展综合得分，数学模型表达式表现如下：

$$F1=0.987*X_1+0.978*X_2+0.530*X_3+0.986*X_4+0.247*X_5+0.965*X_6-0.757*X_7 \quad (2)$$

$$F2=0.101*X_1+0.134*X_2-0.669*X_3+0.085*X_4+0.941*X_5-0.197*X_6+0.243*X_7 \quad (3)$$

$$H1=[\lambda_1/(\lambda_1+\lambda_2)]*F1+[\lambda_2/(\lambda_1+\lambda_2)]*F2 \quad (4)$$

公式（2）和（3）显示了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结果得出的主成分表达式，公式（4）中的 λ 为特征值。同理，重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重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重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根据四个一级指标拟合的乡村振兴指标也分别采取上述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重庆乡村振兴综合得分（Z）及其分项得分（H1、H2、H3、H4）。

将拟合结果描绘成折线图，如图 1 所示，根据图 1 可知：2000—2016 年，重庆市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发展四个维度的分项指标发展指数总体上都呈现上升的良好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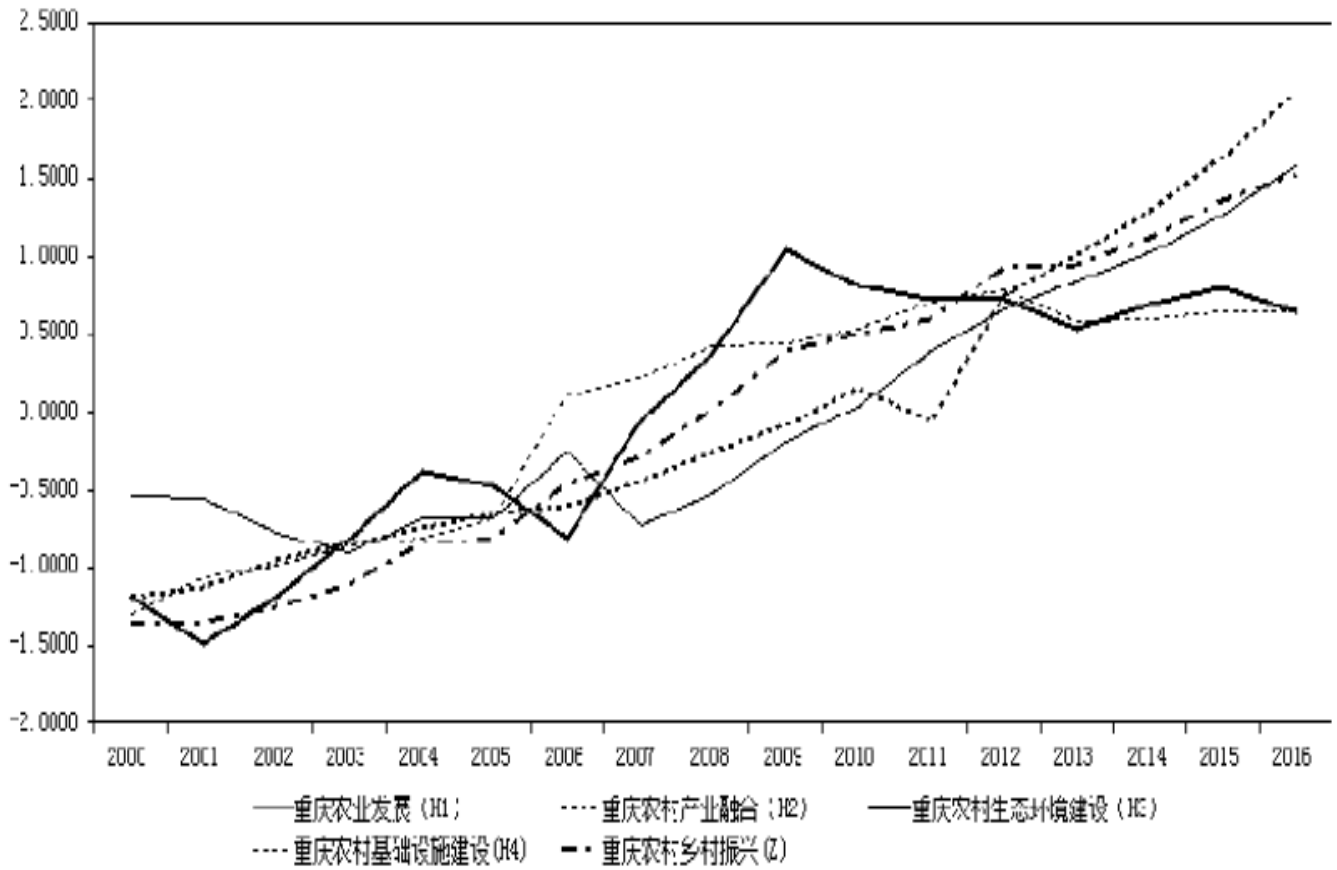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6 年重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主成分的综合主成分值

三、重庆实现乡村振兴的推进机制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分析其影响因素，更需要化为顶层设计，从机制上保障其高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府扶持机制、金融改革机制、土地利用机制、人才吸引机制、平台搭建机制，是从土地、金融、人才、平台、制度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上，保障重庆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部分以前文计算的重庆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支农、金融服务、农地流转、人才投入、技术引进因素为自变量，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这些因素对重庆实现乡村振兴的影响。

$$\ln X_{CZ} = \beta_0 + \beta_1 \ln LAN_t + \beta_2 \ln HUM_t + \beta_3 \ln TEC_t + \beta_4 \ln FIN_t + \beta_5 \ln GOV_t + \varepsilon_t \quad (5)$$

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XCZX），采用前文计算的综合指数加以表示。

解释变量：(1)土地流转（LAN）。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随着互联网与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融合发展，加之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实施，必将带来农村土地的规模化流转。与土地流转相关的“三权”分置制度、放活经营权作为重点，农户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出租、入股、托管等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由于无法获得连续性的农地流转总量，而且家庭作为农地经营的基本单元，农地流转必然会导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变化，农地的流转强度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变化同向，因此本文采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单位：亩/人）来衡量土地流转。(2)人才培育（HUM）。人才匮乏将直接影响和制约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没有人才，好的政策无法顺利实施，乡村优质的资源也难以有效利用。因此，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将培育本土人才与引进外来人才相结合，打好“乡情牌”，念好“引才经”，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在此采用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单位：年）来衡量农村人才培育水平⁽¹⁾。(3)技术推进（TEC）。农业发展中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机械装备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推进农业发展增产、提质、节本、增收、保护生态。在此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万千瓦）来衡量。(4)金融服务（FIN）。社会资金、工商资本投资于农业、农村，能够集成利用资源要素、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为农村居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在此采用农村贷款比率衡量，即农村贷款与农村GDP之比（单位：%），其中，农村GDP由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构成^[25]。(5)财政支持（GOV）。财政投入能够通过税收、法律等手段，围绕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等，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还能通过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为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里基于数据可获得性，采取政府财政支农水平占GDP的比重（单位：%）来表示。

对于以上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对每个变量取对数。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于少数年份的缺失值，采用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平均值代替。

（二）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普遍存在趋势性，可能不满足误差项无自相关的假设，因此上述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主要问题在于可能存在伪回归，因此我们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得到更接近真实的结果。通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上述变量进行检验（由于涉及多个回归模型，限于篇幅，在此省略结果），得到各变量都为二阶单整，并且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结果分析

采取最常用的自相关修正方法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原模型进行适当变换以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进而利用OLS来估

计回归参数，同时在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中剔除了每个模型中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土地流转、技术引进、人才培育、金融服务、财政支持均与乡村振兴呈显著的正相关，与一般经验相符。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原因。

第一，在土地流转上，重庆正积极试点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让农村“沉睡”资源活起来，在土地利用上，用好用活“三权”分置政策，对农村耕地、林地、水域、集体资金等生产要素清产核资。同时，为加快确权与确股，重点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资产的股份，以家庭为单位，量化到人、确权到户；并且，对财政投入农村形成的资产，也将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分类确权确权，推动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第二，在技术引进上，重庆紧扣“371+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体制机制，以创新驱动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据重庆特色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人才需求，从思路、培训、机制、管理上进行创新，逐步建设起一支“素质高、技能强、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26]。

第三，在人才培育上，近年来，重庆加强“三农”工作干部培养、配置、管理和使用，着力培养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改革乡村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建立符合基层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制度设计及配套服务政策的制定，推进人才下乡通道的畅通。通过科技特派员选派计划、“万名专家服务基层行动计划”，不断输入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乡村。综合运用脱贫攻坚等相关政策，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和青年农场主培训、农村电商人才培训等项目，回引本土人才回村挂职带领群众创业^[27]。

第四，在财政支农上，近年来，重庆发挥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从“精准使用”扶贫脱贫资金、改革农业生产补贴方式、改变资金分配方式、试点财政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为切实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环境、改革农业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五，在农村金融上，近年来，重庆从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以激励金融机构投放贷款的积极性；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以增强农村抵押融资能力；发展普惠金融以引导金融机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三农”领域的效率和水平等三个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目前，重庆已设立38家村镇银行，实现了涉农区县村镇银行全覆盖；全市的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初步形成了“乡有网点、村有自助设备、家有手机银行”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28]。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农业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构建了重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6年相关指标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重庆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重庆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得分不断提升，重庆农业发展水平和重庆农村产业融合是影响重庆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机制研究得出，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人力资本改善、农业技术进步、财政支农水平和农村金融水平对于促进重庆实现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这些结论，可获得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为重点，落实政策引导乡村振兴。围绕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个方面，构建完善的体系，推动重庆农业高质量发展。重庆要念好“山字经”、做足“水文章”，不断培育壮大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加强农产品品种、品质、品牌建设。面向都市，发展小众农业、家庭农业和精品农业。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休闲旅游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

第二，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解决好农村生态退化、资源粗放利用、过度开发

和污染治理问题；积极改善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生产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建设，推进村容蝶变，营造良好宜居环境；弘扬农耕文明和乡贤文化，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倡导文明新风，唤醒农村文化之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第三，完善保障机制，服务乡村振兴。在土地利用机制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要素的城乡平等交换，不断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及其中介服务、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中基层组织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农地流转的金融和保险服务、加强农地保护和管理，让全市强农惠农的力量充分汇聚起来，为农村产业融合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

在人才吸引机制上，强化乡村振兴参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探索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专家库、特色新型智库，整合集聚新型职业农民、“三农”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才、乡土人才各类人才，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促进各路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在技术推进机制上，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大智移云”技术，打造智慧农业、促进农业资源共享、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繁荣、破解“三农”融资难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在财政投入机制上，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创新使用方式、提高支农效能。提高各种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多以贴息、担保或以奖代补的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不断促进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走进农村农业领域。在金融服务机制上，鼓励农村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向农村相关项目。

参考文献：

- [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李静,高继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4(2):62-66.
- [3]杨曙辉,宋天庆,陈怀军,等.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S1):398-403.
- [4]董梅生,杨德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4(4):14-24.
- [5]方健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4,27(6):76-80.
- [6]李宾,孔祥智.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研究[J].经济学家,2016(8):55-64.
- [7]李伟,马永谈.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27(3):5-9.
- [8]邓卫平,侯俊军.财政支农方式、结构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研究[J].求索,2015(7):54-58.
- [9]刘晗,曹祖文.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农业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12(12):84-90.
- [10]黄庆华,姜松,曹崢林.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动态转换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2):93-101.

-
- [11]邢晓柳.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基于VEC模型的实证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5,31(6):666-668+747.
- [12]蔡书凯,倪鹏飞.极化抑或涓滴:城市规模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7(7):46-55.
- [1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张曙光.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J].管理世界,2010(7):66-85+97.
- [14]戴林送,杨国才.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5):840-845.
- [15]李永宁.江苏省农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3):106-108.
- [16]沈费伟,肖泽干.国外农民协会发展模式及对中国的经验启示[J].世界农业,2016(9):23-29+113.
- [17]李婷婷,龙花楼.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10):149-155+138.
- [18]何成军,李晓琴,银元.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5):158-162.
- [19]马晓河.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J].经济纵横,2019(2):1-7+137.
- [20]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2):92-97.
- [21]闫坤,鲍曙光.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及实施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19(3):90-97.
- [22]申云,李京蓉,杨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2):50-60+196.
- [23]霍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模型的实证考察[J].兰州学刊,2018(3):104-122.
- [24]杨头平,潘桑桑.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与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8,38(12):119-125.
- [25]赵洪丹,朱显平.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2015,37(5):96-108+127-128.
- [26]周雨.重庆立足“四个创新”建设农村实用人才队伍[N].重庆日报,2018-09-10.
- [27]王斌来,崔佳,李坚.重庆:引导人才向乡村集聚[N].人民日报,2019-03-22(1).
- [28]李相博.重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找准痛点缓解农村融资难[N].重庆日报,2018-12-04.

注释:

1 人均受教育年限指农村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其中，小学按 6 年、初中 9 年、高中和中专 12 年、大专以上 16 年计算，计算公式为：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人口比重×6+初中人口比重×9+高中及中专人口比重×12+大专及大专以上人口比重×16。